

認識二十世紀中國

- 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二十世紀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轉型性的時代之一。從政治角度來說，二十世紀見證了繼大清帝國之後中華民族國家在1912年的誕生；也見證了中國逐漸崛起成為大國。二十世紀的中國進行了各種政治和社會形態實驗，其中最具有影響的形態來自於蘇聯。圖為柯偉林近照。



陳意新 (以下簡稱陳)：自從1970年代易勞逸 (Lloyd Eastman) 對中華民國史做出了開創性研究以來，二十世紀中國史領域在美國學術界已變得日益重要。許多年輕一代的中國史學者從事二十世紀中國史的研究。您可不可以

簡要介紹這個領域在過去20年裏的發展？

柯偉林 (以下簡稱柯)：簡單地說，這個領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部分地是因為我們——在中國以及在其他地方——有着比其他任何時代更多的現存資料 (儘管二十世紀的中國政府有着許多隱秘性)；同時也因為二十世紀被視為是中國漫長歷史上最具有轉型性的時代之一。從政治角度來說，二十世紀見證了繼大清帝國之後中華民族國家在1912年的誕生；也見證了——從1945年對日抗戰勝利和過去20年裏日益增長的國際聲望——中國逐漸崛起成為大國。二十世紀也是中國工業化的世紀，而工業化根本改變了中國人如何工作以及在哪兒工作，他們製造甚麼、消費甚麼、穿戴甚麼，他們在哪裏生活、甚至如何死去。毫無疑問，二十世紀在中國也像

* 本文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威爾明頓校區歷史系副教授陳意新博士於今年5月間對哈佛大學歷史系柯偉林教授的筆錄式訪談稿。感謝陳意新博士整理成中文稿給本刊發表，而全文的英文稿將在今年內的《中國歷史學家》刊出。

在其他許多地方一樣，是一個進行各種政治和社會形態實驗的世紀，其中最有影響的形態來自於蘇聯。

基於以上這些理由，我們有了許多關於二十世紀中國史不同領域的重要著作。易勞逸在很大程度上關注這樣一個問題：「為甚麼國民黨失去了中國？」而較為新近的著作則審視各種能被視作為穿越了中國近代史上政治分界線的歷史類型。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研究了1949年以前和以後的勞工動亂和群眾運動，發現1949年「解放」以前的勞工衝突延續到了1950年代，這是重要的研究成果(我建議研究當代中國勞工衝突的學者看一看裴的著作)。賀蕭(Gail Hershatter)對於妓女研究的突破性著作也跨越了1949年的分界。而任何一位研究對外關係的學者，都必須從1949年以前共產黨的外交政策、從中國對外政策中更為永久性的利益背景來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民國期間高度專業化和訓練有素的外交家群體不僅將這些永久性利益說得非常透徹，並且做了許多工作以恢復中國的主權。朱莉(Julia Strauss)關於民國期間政府專業化的著作對此有許多論述。

其他領域在回顧歷史時也發現，1949年以前的歷史類型甚至持續至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後，儘管這些類型曾經被取代。在最新的商業經營史研究領域裏顯然是如此。雖然1910-20年代的中國資本主義先是被國民黨削弱、後又被共產黨摧毀或流放，而當代中國則幾乎以歡呼的語調來看待這一資本主義活躍地重新崛起。程麟蓀關於中國銀行業的著作將迫使學者們重新評價商業經營史，今天中國每個從事

於銀行業改革的人都應該讀一讀這本書。

奇怪的是，停滯的研究反而是在1940年代後期和1950年代初期早已提出的問題：中國怎樣真正變成了共產主義？中國真的變成了共產主義？對國民黨的重新修正著作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同情地描繪它，而對共產黨的重新修正著作現在則通常對其高度批判。共產黨的確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正如既有的研究指出，它的勝利不是因為任何「農民革命」，而是在於軍事上的優勝。共產黨比它的對手有着更優秀的將領、能更有效地動員人力資源投入戰鬥。但我們對共產黨勝利的了解依然很不完全，因為西方還沒有任何關於國共戰爭真正的軍事史著作。在我個人看來，共產黨的勝利是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社會的軍事化大背景之下的一部分，這一軍事化進程在文革中以各種方式達到了頂點。不過，這一課題還有許多研究要做。

陳：對過去20年的發展，您的著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您的著作《德國與中華民國》和論文《近代中國的延續與變化：大陸與台灣的經濟計劃，1943-1958》中，您認為民國在現代化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共和國在中國的現代發展上是它的繼承者。您的著作因此開啟了重新詮釋中華民國史的修正風氣。但毛澤東曾經說過，新成立的共和國是「一張白紙」，在上面可以繪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或者說人民共和國並沒有從它的前政權繼承任何東西。毛的論點與您的南轅北轍。您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史裏的民國政權以及它對人民共和國的影響有多重要？

沒有哪個國家會是「一張白紙」，更不用說像中國這樣具有豐富多彩歷史和各色各樣傳統的國家。即便試圖重寫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在工業政策上還是部分地遵循着他人制訂的藍圖。毛的政權是歷史的類型和蘇聯的模式混合物，他的黨是國民黨「黨國」的鏡像。

共和國前30年糟糕透頂的記錄與最近20年的成就恰成對照；而最近20年的成就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毛主義核心幾乎被全盤拋棄。當今中國最高領導層可謂二十世紀以來最有領導能力的，但他們依然處於毛制訂的政治制度限制之下。他們為了自身的合法性，似乎無法進行政治改革。

柯：沒有哪個國家、地方會是「一張白紙」，更不用說像中國這樣具有豐富多彩歷史和各色各樣傳統的國家。毛試圖重寫中國歷史，並且也確實重寫了，但他的重寫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而言，卻是極端的悲劇。然而即便是他，至少直到大躍進之前，在工業政策上還是部分地遵循着他人制訂的藍圖（例如孫中山和國民黨）。毛的政權是歷史的類型和蘇聯的模式混合物，他的黨是國民黨「黨國」的鏡像（假如是一個更有效力的鏡像的話）。或許，人們甚至可以說，他的詩詞還是從歷史中衍生的。我覺得我們不要太刻薄。

假如我們觀察整個二十世紀的各種主要趨勢，那麼1958-71年毛主義大量過激行為的時代只是一個例外。對於中國通過國際合作以求發展的趨勢，毛的過激行為是例外；對於通過結盟與條約來保障中國人民的中國安全戰略，毛的過激行為也是例外。在面對一個或者兩個超級大國可能會把中國完全摧毀的同時，毛反而把中國置於前所未有的最危險的國際位置。對於近代中國每個政府的一項重大使命——培育和提昇中國人民的技術才能，毛的年代反而壓制它，也是例外。只有暴君才能想像得出它具有重新「描畫」整個國家的能力，而毛澤東決不是聖人。

陳：然而，正如您在著作裏注意到，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有着很多麻煩。您也提醒我們，國民黨政權採用了它在大陸時同樣的發展戰略，在台灣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這一對比不可避免要使人發問：為甚麼國民黨在大陸沒有成功但在台灣卻取得了成功？

柯：我剛完成一篇文章，比較1950年代的中蘇關係和中美（在台灣）關係。我相信部分原因在於這十年裏國際夥伴關係的性質，但更大的原因則在於：台灣的國民政府不再為許多導致它在大陸垮台的壓力所傷害。這個政府（高興地）消除了它自身的許多腐敗因素，並（同樣高興地）接收了許多工程師和技術人才。這些人在1946年被派到台灣，而在1949年卻無法離開。毫無疑問，國民黨事實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改革了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列寧主義政黨化，維持着嚴密的政治控制，但沒有頑固地阻礙經濟的發展。這一發展戰略在冷戰時代是可以維持的，但在冷戰後卻不行。

陳：對比國民黨後來的成功，我忍不住想請您詮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您是否認為這場革命提供了一個不同於國民黨的現代化發展戰略？您如何解讀這場革命及其後果在二十世紀中國史上的意義？

柯：共產主義革命非常獨特。很少中國人受到過大清帝國滅亡和民國奠立的直接影響，但我也在一篇文章裏寫到過，「沒有一個中國人不受到過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致命的混合體制的影響，即毛澤東所稱之為的中國共產主義」。「解放」的偉大允諾，特別對農村來說，隨着第一次土地改革而暫時實現，然後在隨後而來的集體化和公社化中被摧毀。這一場災荒的主要犧牲者，正是為數3,500萬至4,000萬的農民，而這場災荒無疑是毛澤東的政策和政治（可以說確實是無意）的創造。在我的一篇論文〈作為歷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我對共和國前30年的

各種結果評價極低（這30年間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國家安全事務方面的表現，確實很難想像有其他政府可以做得更好）。這些年代糟糕透頂的記錄與最近20年的成就恰成鮮明對照；而最近20年的成就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毛主義核心幾乎被全盤拋棄。可以說，當今中國的最高領導層是二十世紀以來最有領導能力的，但他們以及中國，依然在毛制訂的政治制度限制之下。他們為了自身的合法性，似乎無法進行政治改革。

陳：正如您已在這裏以及其他地方提到過，中國的對外關係，特別是與西方的關係，在近代史上扮演了一個關鍵、大體上積極性的角色，而毛主義的孤立對中國的現代進步而言是巨大的挫折。但在半個世紀以前，毛澤東告訴中國人：如果中國的歷史進程沒有被西方帝國主義打斷，它也最終會自動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或現代發展。這兩種不同看法形成了黃宗智所說的理解西方對近代中國影響的一個「歷史悖論」。您怎樣看待這一「悖論」？

柯：它是一個悖論，因為帝國主義（並不僅僅是西方）既抑制也促成中國的經濟發展。今天很少有嚴肅學者仍然按照毛所理解的那樣，相信中國的工業資本主義「萌芽」比西方更早。我們知道，中國有深厚和活躍的商業傳統，特別是清代大致上有一個用前工業標準來衡量是發展良好的私有經濟。從清到現在，中國所有政府有着一個雙重使命：在尋取外國的專門知識的同時限制外國的控制。總體來看，它們可以說是成功的，而比較不平衡的則

是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成功的水平。清朝和民初一直把經濟發展理解為基本上是發生在私人手裏的現象，有着國家的支援和管理；然而國民黨和共產黨則決定國家本身首先應該指導、然後再擁有生產手段。這兩個政權都在某些領域裏取得了成功（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但從長期的經濟發展來看，它們的做法卻有着非常負面的作用。最終扼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不是帝國主義，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

陳：您在《亞洲研究》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關於近代中國商業立法的文章裏，討論了從民國初期以來國家政權對商業行為規範化所做的努力。但即使在今天，中國也依然在為規範化而奮鬥不已。從您對二十世紀中國史的研究中，您覺得規範化和建立制度對中國的發展有甚麼樣的重要性？中國的制度現代化有些甚麼主要障礙？

柯：在過去和現在，障礙來自於制度和政治本身。例如，在私營公司不相信政府會公平地向它們徵稅，也不相信能夠依靠法庭來保護它們免於政府的苛索時，國民黨的《公司法》無法使私營公司信服地到政府註冊。今天也同樣，只是整個情況變得更為複雜。今天的政府把自己財政的「健康」危險地寄託在國有體系上（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這從任何國際標準來看都確實是非常「不健康」的。

先是國民黨，後是共產黨，兩者都不願容忍半自主的商業階級，這是為甚麼直到今天依然缺乏一個能讓中國的公司自主地進行管理的非政治化結構。在台灣，國民黨需要依賴台灣

清末和民初一直把經濟發展理解為基本上是發生在私人手裏的現象，有着國家的支援和管理；然而國民黨和共產黨則決定國家本身首先應該指導、然後再擁有生產手段。從長期的經濟發展來看，這種做法有着非常負面的作用。最終扼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

人中的商業精英，學會了與他們共存，而在同時，銀行和司法制度逐漸地改革了。共產黨今天在某種程度上正在模仿這一做法，但它對企業的控制(即使企業中並沒有國家的財產投入)依然很大。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很難找到「純粹私有」企業的領域。晚清的商會給予了企業一定的權力和自主，而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晚清的程度。

中國的政治發展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者的統治下受到了最早從蘇聯學來的黨國政治結構的抑制。推測未來不是歷史學家的責任，但一種制度在它自己的祖國都已經被拋棄之後，中國仍然保持着它而不做任何根本性的改變，這似乎就有點稀奇古怪。

陳：就晚清而言，您這裏似乎指出了傳統文化的作用。但自從五四運動以來，許多中國知識份子高喊着要拋棄傳統，以使中國能夠成功地實現現代化而不為傳統所累。傳統性和現代性的對抗問題已經困擾了中國知識界幾十年。但到了1980年代，中國似乎已經決定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獨特的現代化道路。您怎樣理解傳統文化在中國社會現代轉型中的角色？如果不是基於傳統文化，中國在甚麼基礎上能夠建立起「中國特色」？

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的一個「特色」是：「特色」本身事實上幾乎完全是在外來政治模式的基礎上產生。從議會主義到法西斯主義、再到共產主義，所有這些制度都具有「中國的」特色，但它們都不是真正起源於本土。

而在二十一世紀初，我們看到儒教不僅沒有死亡，相反還獲得了新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為共產黨的領袖們所用。我們還看到各種宗教也在中國戲劇化地成長。我們現在還無法知道所有這些將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和文化發展有甚麼影響，但沒有哪個國

家可以說它有着自己獨有的「特色」。我也不希望中國盲目地模仿任何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特別不要模仿我的國家)。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政治發展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者的統治下是如何地受到了最早從蘇聯學來的黨國政治結構的抑制。推測未來不是歷史學家的責任，但一種制度在它自己的祖國都已經被拋棄之後，中國仍然保持着它而不做任何根本性的改變，這似乎就有點稀奇古怪。

陳：聖路易斯市華盛頓大學的自由史研究中心委託您主編多卷本《自由史》的最後一卷的中國卷。可是，「自由」對中國文化和歷史來說是個外來的概念。在您所界定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黨國」統治下，中國幾乎沒有發展自由的空間。這使我感到疑惑，您將怎樣理解、或從那些領域來討論自由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或壓抑？

柯：這一卷將審視過去和現在中國的自由和自主的一些「領域」，它並不只是關於政治自由，甚至主要也不是關於政治自由。

整個專案是基於這樣的一種認識：如果「自由」的歷史需要就一個非西方的社會進行深入研究，那麼關於自由的強有力的論點應該來自於對中國的研究。可以就中國自身的歷史條件來展開研究，也可以把近代中國與近代西方對比來進行研究，或更好地是兩種方法同時採用。在二十世紀以前，中國有着世界歷史上最悠久、最延續的政治和律令傳統，這些傳統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整個東亞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性質(當代「亞洲價值觀」的

笨拙模仿畢竟有着它的歷史根基)。兩千年的律令和實踐建立了刑法和(事實上的)民法傳統，在其之下出現了個人和社群的自主空間。這些傳統與地中海和北歐社會的傳統不同，即便在今天也仍然不一樣。然而我們能夠探討這樣一些一般性的領域：精英治國而無須涉及政治平等；公民治理而無須有公民社會；商業資本主義而欠缺獨立的城市政體；社團性自由(例如行會)而不必是個人自由權；訴訟性的法律文化而只有很小的法律專業；異議者和抗議者反暴君的各類聚會但卻在天命專制政體的面前；等等。中國帝制時代的政治、律令和哲學結構在1911年後已基本被拋棄，二十世紀則成了一個競爭的世紀，試看到底甚麼將取代傳統的結構。在這一競爭中，西方的自由、「解放」和民主的概念主宰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在世紀結束時，人民共和國面臨着要求政治改革的國內外壓力，而在1912年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卻在離開大陸海岸的台灣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權。對「大中華」——大陸、台灣和香港——的13億中國人而言，「近代自由」正處在一個界定的過程中。

這一專案的目標是收攏並指出關於近代中國政治、律令、商業和倫理等制度研究的最新重要著作，並將這些制度置於一個比較的、國際的角度之下。在過去幾十年裏，西方學者顯然是從柯文(Paul Cohen)稱為「從內部研究」或「中國為中心」的方法裏研究中國歷史。比較而言，我更強調從「國際化」來界定近代中國的進程，並在最近評述了一大批重寫中國政治、商業和

教育制度的著作，試圖把其餘的世界搬回中國。

這一卷將包括四個部分：一、帝制晚期中國的公民領域；二、民國立法的嘗試和它的局限；三、二十世紀中期自由在中國的衰落；四、自由化、多元化和政治自由的出現。

陳：不久前，您還被徵召到美國國會做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教訓」的報告。您是否可以也簡單地在此報告一下有那些「教訓」？

柯：我很高興把我在1998年4月向國會做的報告做些摘要附在此：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文明，但它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直到1912年當亞洲的第一個共和政體中華民國宣稱承接了滿人的統治後，「中國」才成為一個政治實體而存在。而當時民國面臨着的問題成了貫穿二十世紀中國史的主要問題。甚麼是「中國的」統治領域？中國將怎樣與外部世界互動？甚麼樣的政府制度將取代古老的帝制？這些是我要討論的問題。

1、中國的疆域

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所繼承的，並不是我們通常所稱的「歷史中國」，而是一個龐大的清帝國——它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擴張包括了滿洲、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其他一些地區。1912年之後，這些疆域得到了國際承認，因為當時列強均持一種可以說是正確的看法：分裂的中國將是導致國際動亂的根源。然而，完成維護疆域任務的卻是經常居於弱勢的歷屆中華民國政府，它們所賴以維繫其疆域的，是高度受壓制卻又富於創造力

在過去幾十年裏，西方學者顯然是從柯文稱為「中國為中心」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而我更強調從「國際化」來界定近代中國的進程。甚麼是「中國的」統治領域？中國將怎樣與外部世界互動？甚麼樣的政府制度將取代古老的帝制？

並且永遠堅忍不拔的外交。有關這一論題的詳細討論，請參閱我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7年12月號（總第44期）上發表的〈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一文。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承接了一個在國際上成功維持了中國的地位、在內政中恢復了完整主權的政權。

2、中國的國際化

中國疆域的界定發生在一個匆忙、無可避免的本土國際化的世紀。人們通常認為中國只是過去20年裏才「開放」，但這並不是事實。相反，孤立主義年月（1960-72）只是二十世紀中國的國際合作中一個明顯例外的時代。

如果中國自己要消除帝國主義時代所強加的恥辱，國際合作是必需的。例如，在二十世紀初外國人在中國享有通過武力和條約而獲得的特權，但是通過艱難和無休止的談判，在1940年代中期中國收回了它的「內部疆域」：外國人擁有的租界、都市和治外法權。

沒有國際化，二十世紀中國的工業化是不可想像的——它是基於向國際經濟影響實行前所未有的開放。1910年代和1920年代見證了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和獨特的中國資產者的出現。儘管共產主義革命把資本主義流放到中國的周邊，但在1978年之後，它從香港、台灣和東南亞以投資形式而重返，成了1980和1990年代經濟景氣的動力。1930年代以來國家資本主義的成長同樣有賴於外國的合作與投資。現在，在中國的國有工業生鏽和腐爛之際，外來資本正再次尋求通過「公司化」而拯救它。

中國的高等教育也同樣大體上由國際世界所塑造。中國有一個世紀歷史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坐落在原教會學校燕京大學的校園裏。美國、歐洲和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每一個都對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訓練產生了影響。同時還有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浪潮：1900年代在日本；1910年代和1920年代在美國；1930年代在德國；1950年代在蘇聯和東歐，並且於1980年代再次、然而是大規模地流向美國。只有這最後一次我們可以說是中國的「智力外流」，而從台灣的經驗來看，它只是短暫的現象——台灣從1950年代開始也有過成千上萬的學生留學美國。

與世界大國的政治合作對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的生存非常關鍵。在1930和40年代，中國曾與世界上三個最強大的國家——德國、蘇聯和美國——保持一致以抵禦第四強日本。從1942-60年，中國通過尋求與兩個「超級大國」的正式結盟來確保國家安全，先是與美國，然後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後，部分地為抵禦美國而與蘇聯結盟。

儘管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中國在1950年代處於「孤立」，但中國從來沒有像在冷戰中最熱火的年代裏那樣深深地融入一個國際體系。中蘇同盟是中國歷史上說得最明白無誤的軍事同盟，然而它同時也是文化和教育的同盟，亦是經濟的同盟。

在整個二十世紀裏最醒目的是：自我意識地用國際範疇對中國文化全部重新審視，特別是政治文化。每一屆政府都從具有國際標準的這種或那種「主義」體系裏尋求合法性，從憲政主義直到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是中國不停實驗各種外來政治制度的年代：1912-13年的議會共和，1913-16年的軍事獨裁，1916年的君主立憲，蔣介石的「儒家法西斯主義」，毛澤東和其繼承者的各種共產主義。但從1920年代起，政治實驗一直發生在一個經久的制度結構中：列寧主義的黨國。

3、統治中國

具有諷刺意味和無可避免的是：近代中國在尋求作為自己命運的主人的時候，總是從外國的政府那裏尋求模式。沒有一屆政府認為復辟大清政體可以解決中國二十世紀的危機。因此，二十世紀實際上是中國不停實驗各種外來政治制度的年代：1912-13年的議會共和，1913-16年的軍事獨裁，1916年的君主立憲，蔣介石的「儒家法西斯主義」，毛澤東和其繼承者的各種共產主義。但從1920年代起，政治實驗一直發生在一個經久的制度結構中：列寧主義的黨國。它在中國有兩個化身——國民黨和共產黨。黨國是一黨之國。國民黨政權奠基者孫中山制訂了黨國教育中國人民如何民主的使命：「訓政」將為六年。但對於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大陸和台灣中國人來說：「訓政」訓了60年。而在國民黨人於1949年被趕出大陸後，取而代之的是共產黨人的另一個黨國，一個生存到了今天並更具集權統治的黨國。

黨國的目標並非僅是領導政府，它還要改造中國人民，以鑄成新民族國家的公民。1930年代中期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的目標是為沒有紀律的人民強加紀律，使他們對民族國家有責任感。毛澤東則在1960年代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把這種改造化的努力指引到一個非常不同的方向。

黨國也是一個尋求發展的政體，它的目的在於自上而下地實行中國的全民動員化和工業化。孫中山1921年的名著《中國的國際性發展》(中文版名《實業計劃》)是為重新統一後的中國的綜合經濟發展做出計劃的第一次嘗試，它一直是一份最大膽的——在

三五、四五、五五、直到十五計劃後的今天——和最值得記憶的國家發展計劃。孫提出的利用國際資本來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主張，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領袖們所廣泛認同，而孫的具體計劃也留下了它們的歷史痕迹。他的「改造長江上游」的兩頁紙提議釀成了75年的努力和爭辯，直到1990年代中期三峽大壩最終開始動工。

黨國還是軍事化的政體。在二十世紀上半期，國共兩黨人都靠武力奪取了權力，而且中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更多的人身著武裝。西方的軍事制度(蘇聯的、德國的和美國的民族形式的)無疑是西方向中國單一最成功的文化輸出。國民黨在大陸軍事失敗後，以軍事戒嚴法作為統治台灣的正式基礎直到1987年。然而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軍事化才走到了頂點。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宣誓捍衛國家，而人民解放軍則誓忠於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他們也的確做到這點了。在今天的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國有經濟(沒有人確切知道是多少)是由軍方擁有並由其直接操作。或許，「人民解放軍公司」可能已變成了黨國中之國。

黨國有一個「領袖」。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所具有的正式頭銜根本不能表達他們對追隨者在精神和範圍上的主宰。直到最近開始，國共兩黨的黨國都被一系列的領袖層內小集團所領導，但這些小集團最好應該被理解為是共謀性的兄弟會而不是政治派別。簡言之，二十世紀中國大體上一直是被一個「領袖」領導下的一小夥人(一打到兩打人)所統治。或許是因為君主政治文化的延續，或許是因為

二十世紀中國大體上是被一個「領袖」領導下的一小夥人所統治。對個人領導權的重視顯示了黨國的最大弱點：它沒有能力與公民的精英合作建立經久的、自我複製的政府制度。在二十世紀結束時的共產黨黨國，還沒有展示出它能夠把權力轉移到具有經久合法性的公民的政治和合法機構中去。

以往中美兩國合作比較緊密時，是基於共同的敵人，而不是經久的共同利益。現在，美國和中國有着許多共同的利益，但也有着經久的政治差異。兩國政府今天的共同使命比前幾代政府更為複雜，因為關係變得更不容易界定並且更難處理。

蘇聯和法西斯的影響，黨國需要一個單一的首腦，即「元首」（希特勒頭銜Führer的中文譯名）。黨國是否能夠在政治競爭中（像在台灣）或集體領導下（像在人民共和國）生存下去還有待觀察。

4、教訓

對個人領導權的重視顯示了黨國的最大弱點：它沒有能力與公民的精英一起合作以建立一個經久的、自我複製的政府制度。公民可以為黨國服務，但不可以有分離於黨國的單獨統治權。人民共和國像它的前代國民黨黨國（以及滿洲征服者）一樣，起源為一個軍事征服的政權。但也正如古老的政治智慧所言：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在二十世紀結束時的共產黨黨國，與統治了中國267年的滿清和中國歷史上任何成功的朝代不同，還沒有展示出它能夠把權力轉移到具有經久合法性的公民的政治和合法機構中去，或與這些機構共用。

相反，台灣的國民黨人學會了與那些指導了台灣經濟奇迹的頭腦清楚、權威主義的技術官僚共存。但即便是這些精英也從來沒有行使過獨立於黨國的政治權力、從未向黨國進行根本性的挑戰。1987年國民黨於台灣的「訓政」結束後，黨國的一些習性打死不退：甚至到了1990年代後期，在民主改革已經十年以後，國民黨的中央執委會每星期三開會，為政府內閣每星期四的例行會議制訂議事日程。

促進台灣民主化的壓力主要來自於社會的其他部分，最主要的是佔台灣居民大多數的本省籍人——他們已對國民黨外省籍人的長期統治忍無可

忍。台灣的經歷是否也會有力地發生在其他地區？從短期來看，中國確實有足夠的力量維繫少數民族地區。當從更長期、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記住：沒有任何一個中華帝國像大清和它的現代繼承者們一樣如此龐大和久遠。假如它最終變得小了一些、像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樣，或者簡單地「放鬆」些，像清代的偉大天才用「鬆疆」的方式來統治這些地區，那麼它怎樣做，是否能夠和平地做到，都具有極其的重要性。

歸根結柢，中國未來的關鍵在於它二十世紀的重大的、尚未解決的問題：甚麼樣的政治制度能夠長遠地在古老的帝國裏生根？二十世紀的所有中國政府在維護領土和主權方面遠遠比它們在建立穩定的政治制度方面做得成功。然而，在二十世紀裏，中國幾乎每十年就有一次重大的政治動盪。如果近代史可以有點指導作用，那麼當政治變化來到中國時，中國還會繼續從國際舞台上的各種政治和思想的潮流中吸取啟示。

至於目前，帝國制度直接繼任者的黨國已顯示出它在許多事情上可以做得很出色。它能夠組織；它能夠工業化；它能夠軍事化；它還能夠恐嚇化。但它與1912年消失的制度不同，還沒有能夠「公民化」。我在兩層意義上使用「公民化」。第一，公民化意味着使用中國人民的偉大才能，建立起一個能夠長久的文官制度，將公民的統治確實地制度化。第二，它意味着為建立一個凌駕於政治控制、物質發展和武裝能力之上的文明而堅守人的永久價值。儘管過去的中華帝國有着許多問題，但公民化一直是它的

偉大力量所在。這是為甚麼它的影響能夠輻射到整個東亞。或許，一旦黨國體制在某一天完結，這也將應該是未成型的政治結構所需追尋的目標。

陳：您的「教訓」很可能對美國政治領袖們理解中國和制訂中國政策做出貢獻。歷史畢竟對理解美中關係的發展是重要的。基於這些「教訓」，您怎樣看待美中關係的未來？

柯：每個人都可以從歷史中學到教訓，每個人從歷史中只能學到有限的教訓。在兩國關係史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和美國相互只具有邊際的重要性，甚至較大程度的相互文化交流對兩國政府關係也幾乎沒有影響。當我們兩個政府合作比較緊密時（像在1940年代反對日本的結盟，或像在1970年代反對蘇聯的一致），它是基於共同的敵人，而不是基於經久的共同利益。現在，美國和中國有着許多共同的利益：貿易、國際秩序的穩定和相互文化交流，但我們也有着經久的政治差異。兩國政府今天的共同使命比前幾代政府更為複雜，因為關係變得更不容易界定並且更難處理。困難的任務是保持並且確實加強有着互動與合作的領域，而同時認識到由於政治制度差異導致了各種根本的緊張性——只要差異經久存在，關係便有許多限制。

陳：但一些美國學者認為當代美中關係許多問題的根源是中國的崛起，無論他們把這崛起視為來自於「中國威脅」或美國對中國貿易的逆差。也有一

些西方戰略家認為目前的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安全中並不真正重要，正如近幾年《外交事務》季刊中關於「中國威脅」辯論所展示的那樣。然而，即便是他們的理論也潛在地意味着中國在某一天變得足以強大後，會變得真正很重要。您怎樣解讀中國在國際環境中崛起的意義？

柯：從美國利益角度來進行任何理智的分析，全球貿易事務中與世界各國合作並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的中國——這是對今天中國的準確描繪——不僅不是威脅，或許還是許多領域裏的合作夥伴。中國是一個大國，並且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成員國之一，她有權利也有責任發出它對於國際事務的意見。從中國利益角度來看，她現在沒有在任何邊界地段受到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經濟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她也有一切理由扶持國際合作。

對當今中國政府真正的安全威脅不是來自於外部，而是內部；對東亞穩定的真正威脅不是來自於東亞之外，而是來自中國之內。我擔心如果中國不進行（我衷心希望中國會這樣做）漸進的、穩定的政治改革進程，中國和世界都將要面臨如何處理一個在政治動亂陣痛中的國家。正像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經指明：陷入內亂的中國會對東亞和世界產生戲劇般的、無法預測的後果。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只有中國能成功地建立起穩定的和自我複製的政治制度，並具有經久的合法性，才能繼續在它天然的地位上成長為世界上偉大的和最有影響的大國之一。

當今中國政府真正的安全威脅不是來自於外部，而是內部；對東亞穩定的真正威脅不是來自於東亞之外，而是來自中國之內。我擔心如果中國不進行漸進的、穩定的政治改革進程，中國和世界都將要面臨如何處理一個在政治動亂陣痛中的國家。

陳：很有意義的是，您在太平洋的此岸審視中國時，把清、民國和人民共和國都作為一個和「整個」中國看待，出色地理解的它的延續和變化；而在彼岸的中國歷史學家更多地是把它視為三個、至少是政治上缺乏延續的不同時代。在您的經驗裏，甚麼是您作為一個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的優勢和劣勢？

柯：我們外國人當然是真正的「外行」，研究中國歷史的老外。但我們可以引入不同（並非更好、只是不同）的視野來察看中國的問題。部分是由於它是一個「比較」的視野，部分也由於西方有着與中國的歷史學偉大傳統不同的敘述歷史的方法傳統。同樣，美國人在學習美國歷史時也應該閱讀中國、歐洲和其他地方所寫出的美國史著作，但很不幸，實際上只有極少的這種著作被人閱讀。

陳：哈佛大學的中國史學家包括您在內有時被稱為「哈佛學派」。從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挑戰與回應」、到孔飛力(Philip Kuhn)的「國家與社會」、再到您的「延續與變化」，哈佛歷史學家們在不同的時期都提出了理論的框架，影響了許多中國專家的研究計劃。是甚麼樣的學術作風使得「哈佛學派」具有了特點？

柯：我不認為歷史研究有甚麼能形成「學派」的堅固基礎，部分是因為研究的領域變動得非常快。但如果哈佛的中國歷史學家有甚麼特點的話，那麼從費正清到現在，所強調的一直是以經驗的、檔案為基礎的研究，即便以

犧牲重大理論為代價。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剛又出版了一套指導關於文件研究系列的書：《中華民國的國家與經濟：學者手冊》（兩卷，2001年出版），而我很高興地主編了這套書。

陳：不過，美國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學術在研究近代中國史時呈現了與哈佛經典方法不同的方法。儘管中國還沒有能夠完全現代化，但後現代主義理論已影響了一些年輕的中國學者。您怎樣理解後現代主義學術？

柯：我不認為後現代主義是一個緊湊地結構起來的「學派」。但是，歷史研究的幾種令人鼓舞的方向能讓我們對許多被認為是理所當然、而又沒有被足夠地檢驗過的假設提出問題。舉例來說，在二十世紀裏，甚麼是近代中華「民族」的性質（特別是它的自然性質）？甚麼是中華民族性的革命性建構或（重新）創新？在我的印象裏，只有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著作最好地將想像力詢問和堅實歷史資料結合起來，能夠允許不止從一條線索、並且從多條線索對歷史進行詮釋。

陳：謝謝您接受這次訪談。

柯：很榮幸，也很有趣。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蓋辛葛爾講座教授(Edith and Benjamin Geisinger Professor)，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主任。